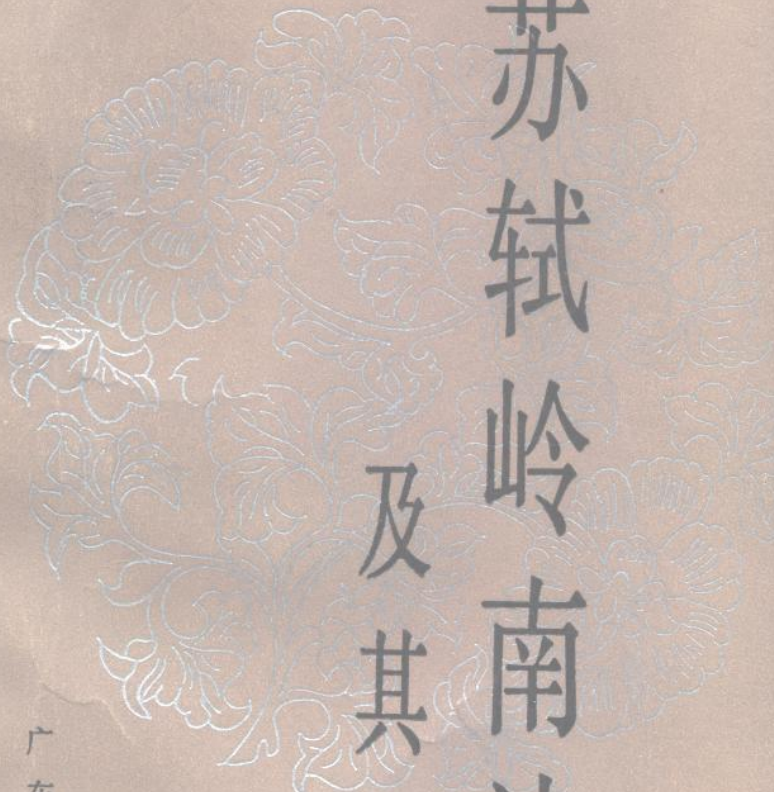


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论苏轼岭南诗 及其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

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苏轼研究学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101552

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

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苏轼研究学会编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插图 277,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20册

书号10111·1533 定价3.50元

DC40/13

目 录

✓在惠州苏轼讨论会上的发言·····	王季思 (1)
苏诗分期评议·····	谢桃坊 (6)
《苏诗分期评议》的评议·····	曾枣庄 (24)
✓论苏轼晚年诗词中的“野性”·····	朱靖华 (42)
苏轼诗的理趣及其审美价值·····	汤岳辉 (57)
苏轼诗的结构特点·····	何江南 (69)
东坡岭海诗的成就和风格·····	刘乃昌 (80)
浅论苏轼岭南诗·····	苏寰中 (92)
苏轼岭南诗作的思想品格·····	林冠群 (109)
、苏轼寓惠诗思想探析·····	洪柏昭 (125)
、苏轼惠州诗的浪漫主义特色·····	王士博 (143)
✓苏轼寓惠期间的思想倾向	
和创作特色·····	余荣盛 (153)
论苏轼的和陶诗·····	唐玲玲 (166)
✓苏东坡在惠州和陶诗的思想倾向·····	王运生 (185)

·从《和陶诗》看苏轼贬惠前后

的思想变化.....李 博 (197)

✓心灵，为陶渊明所吸引陈华昌 (209)

——论苏轼晚年的思想变化

东坡在惠州谪居生活探吴仕端 (222)

✓苏轼后期词散论马兴荣 (240)

苏体辨踪薛瑞生 (261)

——东坡词风嬗替蕃衍论

苏轼歌妓词浅议陈新璋 (279)

论东坡惠州词张志烈 (293)

✓试论苏轼的民本思想包景城 (312)

苏秦交游及其文风陈祖美 (325)

《东坡外集》杂考刘尚荣 (337)

读“苏”别录吴忠匡 (354)

苏东坡日本存知己黄軼球 (366)

——读藤田东湖《惟有苏斋记》

海外苏轼研究简介〔美国〕唐凯琳 (370)

在惠州苏轼讨论会上的发言

王季思

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有不同的意见，展开争论，但没有剑拔弩张的样子，这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也活泼了讨论会的气氛。

大家对苏轼晚年在岭南的思想倾向问题，争论较多。他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还是道、佛？是消极出世，还是积极入世？对个人前途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想这是否存在一个问题，即关于苏轼世界观的属性以及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的问题。不论儒、释、道，它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为维护这个社会的封建秩序起作用的，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不同，有的似乎积极入世，有的好象消极出世。但如果看不到它们的共同性质，看不到它们的可以互相转化，就把问题片面化了。

明末清初，五台山有个老法师，顺治皇帝请他的徒弟去讲经。这徒弟回来对他说：“我这次讲得连这皇帝都想出家了，下一次再讲，我可以劝化他到这里来做和尚。”老法师一听，痛骂他一顿说：“你怎么糊涂到这个地步，我们佛门是多一个做和尚的皇帝好，还是多一个做皇帝的护法神好？”我们看看，

这个老法师对政治的看法多么高明，他的这番话，究竟是入世法还是出世法？很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历史上有不少道士、和尚，后来做了大官，在政治上起很大的作用。唐代的魏征、李泌，原来都是道士，后来成为一代名臣。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道衍，原来都是和尚，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臣。至于原来在朝廷做大官在政治形势转变时出家做和尚、做道士的，那就更多了。我们能因为他们做过道士、和尚，就说他们的主导思想是道、佛，因为他们做过大官，就说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吗？实际上，这三种思想体系，都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们的表现虽有不同，归根到底是指导人们处理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的。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君、民就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苏轼在朝时要写一些有补于国的文章，在野时要做一些有利于民的好事，这国、民也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国家和人民。苏轼死时，他的学生写了一篇祭文，说：“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这忠义就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忠诚、正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也决不相信有什么玉皇大帝、土地爷爷能看到我们的心事。我们的科学世界观——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到近现代才有可能产生并继续发展的，它不是任何封建历史时期所可能出现，也不是任何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所可能掌握的。这一点，我们必须分清楚，才不致混淆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世界观的界限，才不致把某些历史人物的进步作用夸大到超越他们历史阶段的地步，引入向后看。

至于他们在生活中文艺创作中的表现，有些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根据当时的有效经验加以处理的，例如，苏轼在惠州看到香积寺外的溪水，建议在这里利用水力，制造水磨水碓，

以有利于生产；看到那些向皇帝溜须拍马的人，把荔枝用快马送到京师，向皇帝“争新买宠”，害民害国，发出慨叹、谴责，这是局部地突破了他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才不致走上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把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积极作用都看得一无是处。

现在再谈谈苏轼的生活态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苏轼在贬官岭南时，曾在雷州碰到他弟弟子由，他们在路边买了两碗馄饨之类的面食吃。苏轼两三筷就吃光了，子由吃了一筷，老半天吞咽不下去。苏轼笑着对他说：“子由啊，你还要品品它的滋味吗？”这故事传到苏轼的学生那里，他们说：“这是先生‘饮酒但饮湿’的法子。”“饮酒但饮湿”，是苏轼在黄州写的一句诗，意思是只要有水份的，就可以当酒喝。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比较随和的。可苏轼对自己的诗文创作，也有一句话，是要：“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不论写诗或写文，要达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就必须认真对待，毫不马虎。对生活的随和和对创作的认真，说明苏轼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他在生活上千方百计要求达到自己的意愿，而在创作上却随便应付，任意掺水份，他就不可能在一生里留给我们那么多光辉的诗篇和散文。但是，苏轼在生活上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那么随和的，苏轼在定州、在惠州，都造过好酒，吃的东坡肉、戴的东坡帽，在北宋流行一时，有的还流传到今天。可见在条件许可时，他也讲究点吃和穿的。这样理解，才不至把苏轼的生活片面化、绝对化。对创作，他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求“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他晚年说自己写文章“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就是另外一种写作态度，这态度更多地表现在他的书札、杂文里。如果只看

到一方面，同样会把问题片面化、绝对化。至于他在岭南对人生的态度是消极还是积极，是乐观还是悲观，我同意一位海南同志的发言，即苏轼初到岭南，尤其是到海南的时候，对生活是很不适应的，因此产生过悲观的情绪，消极的态度。后来，生活上慢慢适应了，他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也跟着转变了。也就是说它的变化发展有一个过程，在生活上是由不适应到适应，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是由消极到积极，由悲观到乐观。苏轼贬官以前，在京师做大官，过的是华堂玉食的生活。到了惠州，还有人帮助他盖新房，到了海南就只能住自己搭盖的草棚子了。在惠州，还可以五天十天吃到一餐黄鸡粥、花猪肉，到海南，就只能餐餐啃芋头，喝白开水，在生活上自然要有个适应过程。然而，他到岭南以前，在人生道路上已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尝过了贬谪的滋味，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顺应自然，佛家的随缘自足，早就在他的生活中有所表现。因此，他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中，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

我看了美国朋友唐凯林女士介绍国外研究苏轼情况的资料，比较明显地看出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一般说，他们比较重视作家的生活和作品的风格，我们比较偏重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对作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是应该重视的，但作家的创作总是他自己的生活以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反映，不深入研究他的个人生活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是很难判断他的创作成就的。用我国传统的说法就是“知人论世”。苏轼在北宋时期所以特别受到我们的重视，是因为他在诗词、散文以及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不谈他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对后来人的影响，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今天要讨论苏轼的创作成就，既不能离开他的思想内容谈艺术，也不能离开

他的艺术成就谈思想。这里有三种情况想提供同志们参考。苏轼到岭南后的作品，有些是思想艺术结合得很好，超过了他过去的成就的，象《荔枝叹》、《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诗，以及他过岭后写的给参寥子、谢民师的书札。有些表现了他新的思想认识，艺术上表达得并不好，如他的部分和陶诗。他过岭后，很少写词，写得好的更少，可以说，从思想艺术两方面看，都比他以前的词作退步了。这样结合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从思想、艺术两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这对我们今天的诗词创作怎样力求思想境界的清新和艺术表现的完美，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最后想谈谈深入浅出的问题。研究苏轼，要从他的具体作品，一篇篇、一首首，深入钻研入手，弄清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其中有些影响深远的作品更要反复深入地钻研。有些前人校勘、考证的方法，我们也要会运用，才能弄清真相，还它本来的历史面目。但我们的深入，决不能越钻越深，入而不出，因此，还必须找出他作品里一些表现他共同的思想倾向、艺术特征，以及体现他的创作方法、创作道路的地方，提到我们今天的理论高度，加以概括说明。经过这样深入分析的高度概括，才不至流于一般化的空谈。把苏轼的文艺成就，创作经验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我们在表达时还应该力求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同志们多数是高等院校来的，在教学过程中对这点都有体会，我就不啰嗦了。

苏诗分期评议

谢桃坊

苏诗的总数，据清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笺诗图记》云：“凡得古今体诗四十五卷，计二千三百八十九首”，这是编年的；又卷四十六帖子口号诗六十五首；卷四十七和四十八两卷收补编古今体诗二百四十二首；以上共计为二千六百九十六首。苏轼诗歌的创作活动，从北宋嘉祐四年(1059)十月南行算起，迄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绝笔，共计四十二年。如果对这大量的诗篇和漫长的创作时期没有进行具体研究，则很难概括出苏诗的思想意义及其艺术风貌，而对其评议和分析必然流于空疏。因此，对苏诗的分期具有首要意义。我们可据以从发展阶段的观点对苏诗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进而深入探讨苏诗的创作道路。

由于苏轼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他的诗集如《南行集》、《岐梁唱和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和陶诗》等，在其生前就曾广为流传。这些一时一地的诗集，或由坡公手订、或由友人辑集、或由书坊编纂，已自然地暗示了苏诗分期的特点。苏辙说：“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追和陶渊明诗引》·《东坡续集》卷三)。僧道潜说：“东

坡天才无施不可，其少时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说（按：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诗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及”（《曲洧旧闻》卷九）。以上两说都是从苏诗的艺术渊源出发而提出分期意见的，虽在对其渊源的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可推知他们都将苏诗分为三期，即黄州以前，渡岭以前和岭海诗。稍后胡仔也分苏诗为三期。他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这与苏辙和道潜的意见大体一致，但分期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显然是将苏诗分为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应该说，自南宋中期施元之和顾禧对苏诗编年才为苏诗的具体分期打下坚实的基础。清初邵长蘅删补《施注苏诗》于《注苏例言》云：“诗家编年始于少陵，当时号为诗史。少陵以后惟东坡之诗于编年为宜。常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历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三十余年，其间新法之废兴、时政之得失、贤奸之屡起屡仆，按其作诗之岁月而考之，往往概见事实；而于出处大节、兄弟朋友过从离合之踪迹为尤详，更千百年犹可想见，故编年宜也”。《施注苏诗》之编年以嘉祐六年十一月之诗为始。查慎行《初白庵苏诗补注》始以苏轼南行诗两卷编入，自此编年苏诗自嘉祐四年迄建中靖国元年为四十五卷。此后，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纪昀评点的《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

注集成》于编年和卷次皆沿查慎行之体例。王文浩在编年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苏诗分期的八变说：

公自不诗而至能诗，自名家而至大家，皆于此（嘉祐四年）两三年间、数十篇之内养成具体，到凤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压也。自此以后，熙宁还朝一变；倅杭守密，正其纵笔时也；及入徐、湖渐改辙矣。绍圣谪惠州一变，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隐，不可穷也。

（《苏海识余》卷一）

近世关于苏诗的分期，主要有以下三说：

第一是三期说。此说乃发挥胡仔的意见，将苏轼南行诗及凤翔诗算作少年期，自熙宁还朝至元祐末之诗算作壮年期，岭海诗为暮年期。认为：“盖诗人造诣，略有三境：其初纯任性灵，弥见聪慧，其长处有非学力者所能及，而其失也锋锐而伤格；及年事日增，学力日进，其长处则放笔快意，理富词繁，而其失也恣肆而伤气；惟有有性灵而不锋锐，有学力而不恣肆，以学力辅性灵，以性灵运学力，天人俱至，自造神奇而登化境，斯为成就，斯为上乘”。（严恩纹：《东坡诗分期之检讨》、《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1—2期合刊）

第二是五期说。此说乃将王文浩之分八期进行合并：一、早期（1059—1068）；二、杭、密、徐、湖时期（1069—1078）；三、在黄州、汝州（1078—1084）；四、元祐时期（1085—1093）；五、晚期（1094—1101）（王士博：《苏轼诗论》，《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第三是七期说。此说认为，“与其按自然年序，把他的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如按其生活经历分成初入仕途及两次‘在朝——外任——贬居’而分为七段，并进而按其思想和艺

术特点分成任职和贬居两期：思想上有儒家与佛老思想因素消长变化的不同，艺术上有豪健清雄和清旷简远、自然平淡之别。这是特殊性，也是分期的根据”（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王文浩对苏诗的分期立足于苏诗的艺术变化，亦即风格的变化，虽然他在具体分期和解释上还有错误和不当，但我以为其分期根据还是正确的，而且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作家的全部作品构成一个艺术体系，这个艺术体系所显示的作家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基本特征的统一、作家创作中独特内容和独特形式的统一便是作家的艺术风格。只有“风格能够使我们把不同的作品联结起来研究，使我们看出贯穿在这些作品中的个性演变”（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可见对作家创作的分期是应以其艺术风格为根据，从其艺术风格的发展过程中找出那些重要阶段。这些阶段正是发展锁链系列中很有顺序的互相联系的环节。在这里，风格的概念是大于作家生活经历和思想的。因为作家每一时期的作品都是某一阶段社会生活以及作家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的反映。我们从作家艺术风格的发展中便可见到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的迹印及其整个创作发展变化的轮廓。因此，对苏诗的分期也应以其艺术风格发展所呈现的阶段来确定，只有这样才可能寻到苏诗发展的特殊艺术规律。以苏诗艺术风格的发展为根据，兹可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六个阶段，即早期、凤翔时期、杭密徐时期、黄州时期、元祐时期、岭海时期；又可以“乌台诗案”为限而将这六个阶段分为前期和后期，前后两期各包括三个阶段。谨概略说明于下：

（一）早期：嘉祐四年（1059）十月至嘉祐六年（1061）七月，苏轼廿四岁至廿五岁。

本期苏轼南行诗七十八首，是他练笔的“少作”，无论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是不够成熟的。这部分诗作，苏轼晚年手辑《东坡集》和后来其子苏过辑《东坡后集》均不收入，南宋时施元之和顾禧的编年注苏诗也不收入，可见它在整个苏轼诗作中是颇为特殊的。查慎行为苏诗重新编年始将它收入编年诗，且认为：“施氏原本以辛丑十一月初赴凤翔诗为冠，而已亥庚子所作概弃弗录，开卷便错，何取乎编年？吾不解也”（《苏诗补注》卷一）。纪昀却以为施注本的编年自有根据。他说：“以上二卷（南行诗），大抵少作，气体未能成就，疑当日删定之余稿，后人重东坡之名掇存之耳。施氏本托始辛丑，未必无所授之，未可以疏漏讥也”（《纪评苏诗》卷二）。这时期虽然出现过一些较好的作品，如“刻意锻炼、语皆警峭”的《入峡》，“波澜壮阔、繁而不沓”的《巫山》，“精警飘逸”、构思独特的《神女庙》，“萦回掩映、运意玲珑”的《出峡》等诗，以及思想较为深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牛口见月》等诗，而且某些诗中也初次展示了诗人的一些艺术个性，但总的来说这时苏诗的风格并未形成。很可能这就是苏轼、苏过、施元之等不收这部分诗的原因。可见，如果将南行诗与凤翔诗合为苏轼早期诗，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南行诗为苏轼的试笔，而凤翔诗已形成苏诗所特有的风格了，从苏诗风格的发展来看是不宜将二者合并的。王文浩将它们分为两个阶段是较为合理的。

苏轼早期诗歌创作以五言古诗为主，艺术渊源上则是以学杜为主的。苏轼的幼子苏过来说：“东坡尝语后辈，作古诗当以老杜《北征》为法”（《藏海诗话》）。《入峡》、《巫山》、《出峡》等本期的代表作都是学杜甫五言古诗叙述体例的，而《荆州十首》“篇章字句都合古法，此东坡摹杜之作，纯是《秦州杂

诗”（《纪评苏诗》卷二）。杜诗之受到重视和提倡是与北宋诗歌革新运动分不开的。这种影响在苏轼诗歌创作的早期很为有益，使它趋向于写实。苏轼南行途中，“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东坡集》卷二十四）。南行诗便是“以识一时之事”的作品。学杜也使苏轼早期诗作注意严密的结构和语句的锻炼，虽然有些诗作还显得幼稚和拘谨；然而也有些诗作所出现的构思奇特、精细的体物传神和对理趣的追求又略显了苏诗的某些艺术个性。苏轼坚持写实的创作、丢掉应举的试帖诗习气、逐渐摆脱老苏的诗路并从模仿前人的狭窄的艺术框子中走出来，努力发展自己的优势，坚定地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经过南行的刻苦磨炼诗笔，我们可以随着他的行踪看到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

（二）凤翔时期：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至熙宁四年（1071）十月；苏轼二十六岁至三十六岁；治平与熙宁之初还朝之作也包括在本期。

苏轼自嘉祐六年十一月赴凤翔任，治平二年正月还朝，在凤翔任内三年，共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还朝的八个月作诗六首，旋服父丧返蜀。熙宁二年二月还朝至熙宁四年十月赴杭州任抵扬州，作诗五十六首。将它们合称凤翔时期是因这期间其艺术风格正在形成，而凤翔之作在本期最有代表性。如果将苏轼熙宁二年至四年在朝作的十九首诗便算作一个时期，这是难以成立的。这两年多，由于苏轼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困于烦琐的事务，诗作歉收，而且艺术风格并未呈现新的发展变化，因此，从苏诗的发展过程来看，它仅仅是凤翔诗的延续而已。

凤翔任内正是苏轼政治思想形成之时。嘉祐六年八月——

即到凤翔任之前夕，为应制举而作的策论五十篇（《东坡应诏集》），和嘉祐八年九月在凤翔作的《思治论》，系统而集中地表现了苏轼继承和发展庆历新政的儒家的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苏轼对于当时社会存在的危机有较为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既见到“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情形，也见到改革的困难曲折，他提出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改革方案。苏轼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与苏轼政治思想形成相应，是其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在凤翔期间形成了。凤翔时期，苏诗各体均有较高的成就，而且出现了不少的传世名篇。苏轼最擅长作五古和七古，其次是七律和七绝，这是其诗歌的优势，它在凤翔诗作中已体现出来：五古如《守岁》、《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次韵子由论书》；七古如《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溪陂鱼》；七律如《和子由澠池怀旧》、《和子由木山引水》；七绝如《读〈开元天宝遗事〉三首》、《驪山三绝句》；都是有名的诗篇。苏轼诗歌的新意妙理、汪洋恣肆、意境开阔、气机流走、机锋锐利、窄韵巧押、因难见奇等艺术特点和长于主观抒情、想象丰富神奇、夸张谐谑等浪漫主义气质所形成的艺术本色在这些代表作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可以说，苏诗的豪放艺术风格形成了。正如纪昀评《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云：“笔笔圆劲，大抵东坡诗自是气格方成就”（《纪评苏诗》卷四）。归入本期的苏诗如《谢苏自之惠酒》、《石苍舒醉墨堂》、《送刘道原归觐南康》、《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泗州僧伽塔》等诗，都是凤翔诗风的延续，但其中有的诗已有纵横驰骤的新的发展趋势了。

本期苏诗在艺术渊源上表现为学韩为主、以李为附、转益